

社 会 与 历 史 译 丛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英]彼得·伯克 著
姚朋 周玉鹏 等 译

刘北成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彼得·伯克 著

姚明 周玉鹏 胡秋红 吴修申 译

刘北成 校

译丛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英)伯克(Burke, P.)著;姚朋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571-7

I. 历... II. ①伯...②姚... III. 史学-关系-社会学-理论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967 号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opyright © Peter Burke 1992

本书由 Polity Press 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未经同意,
不得翻印、转载。

本书据 Polity Press 1992 年版译出。

责 任 编 辑	苏 贻 鸣
封 面 装 帧	甘 晓 培
编辑、出版总策划	朱 金 元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英]彼得·伯克 著

姚 朋 周玉鹏 胡秋红 吴修申 译

刘北成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187,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571-7/K·854

定价 18.00 元

社会与历史译丛编委会

刘北成(执行)

郭 方(执行)

刘新成

朱孝远

杨 豫

沈 汉

侯建新

渠敬东

李 康

李 猛

王明毅

FQ07/02

中译本前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新史学”的冷寂之后,无论在史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还是在表达方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成为新文化史的旗手。他的代表性著作已译为三十多种文字,译为中文的亦有多种(《制作路易十四》等,在台湾出版)。欣悉刘北成教授带领研究生翻译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1992 年英文版),嘱余作中译本前言,兹以下文酬之。

第一次得知伯克的名字是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第十三卷上,即这部巨作的终卷。他对整个近代历史进程的宏观哲学把握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又陆续读到他的一些著作。初识伯克却是数年前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一次巧遇,当时他正在作一次文化史的讲座。他身材瘦小,衣冠不整,穿着一件旧黑上衣,上面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商标,给人的感觉是全然不修边幅,全身处处棱角突出。不过最令人注意的是他有一双明亮和清澈的眼睛。从一开讲他就把眼睛直瞪瞪地朝着天花板,直到讲完才把目光移向听众,露出了羞涩一笑。然而,他那睿智的观点和典雅的语言却始终紧紧地吸引着大家。应我们的邀请,彼得·伯克于 1999 年 9 月来华访

问,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了关于新文化史的讲座。

彼得·伯克是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化史教授,1937年生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家庭。从伦敦北区一个耶稣派中学毕业后,他考入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师从于著名的中世纪文化史学家基思·托马斯。这个学院正在崭露头角并以研究早期近代欧洲史而出名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希尔和劳伦斯·斯通无疑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学期间,伯克曾服役18个月,到新加坡的一个地方政府任职员。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伯克说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同不同种族的人们相处,特别是与当地的马来人和华侨共事,胜过选修一门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在圣约翰学院,伯克感兴趣的主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艺术作品,阅读了瓦萨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原文著作,并在当时牛津大学围绕着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和语言哲学的激烈辩论中脱颖而出。

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后,伯克留校任教,同年取得圣安东尼学院的奖学金,在著名历史学家、钦定历史学教授特雷弗-罗珀的指导下写作博士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17世纪的耶稣会,后来把内容扩大到研究1500至1700年欧洲史学发展的新趋势。他说,“只有特雷弗-罗珀才有可能把我引上这条道路”。但这篇规模宏大的论文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伯克已接到新建的苏塞克斯大学的邀请,任命他为该校的第一批讲师。苏塞克斯大学提出了一个“重组社会科学”的宏大计划。伯克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这场教育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引导他开始走上崭新的学术道路,探索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新趋势。

伯克不久就发表了第一批学术成果,包括《文艺复兴》(Renaissance, 1967 年)、《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1970 年)、《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1420—1540 年)》(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 1972 年)、《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传统和创新: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1974 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 世纪上层社会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 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 1974 年)。这些著作虽然都是对文艺复兴这个传统课题的讨论,却给了史学界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旧的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的《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化和社会》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 600 名艺术家。有人认为,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在讨论经济起飞或铁路建设的专题上使用的计量方法确实带有挑战性,却无法应用于文艺复兴的研究。然而,伯克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历史学家能够使用计量的表述来证明那个时代来自威尼斯的艺术家确实多于来自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而且其中的大多数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或接受过某种教育,那么,为什么不能把文艺复兴陈述得更精确一些呢?事实证明伯克确实是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传记集合研究(prosopography)的先驱。

伯克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带来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他试图寻找“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识别出文艺复兴艺术作品中带有的社会信息。这种信息不仅仅指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试图表达的意图,而且要探索接受者们对作品所携带的信息作出何种想象,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

瓦萨里、朗世宁和蒙田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扬起了新的风帆，但他们的作品所携带的信息究竟如何打开读者的思路呢？带着这些问题，伯克的著作运用了数学模式去证明当时和后来有哪些人观赏过这些作品，阅读过这些著作，聆听过这些音乐或诗歌，这些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从中获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对他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什么影响，等等。

如果说伯克早期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对上层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例如《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 世纪上层社会研究》系统地研究了 563 名当地的著名人物，查阅了有关他们的大量档案，比较了 17 世纪这两座城市的上层阶级，并以此为基础呈现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史。那么，以《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 年)为标志，伯克开始把主题扩大到“民众文化”的研究。伯克的这部著作可以说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齐名，尽管篇幅小得多。这与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同巴西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玛丽亚·露西娅结婚以后从苏塞克斯大学转到剑桥大学，担任伊曼纽尔学院教授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人们普遍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这两个概念相割裂的时候，伯克寻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认为，16、17 世纪，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还没有形成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文化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歌伴你入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一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进入这一文化的入口必须通过某种学校，如拉丁语学校等，它们只向部分人开放。因此，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精英文化，另一边是大众文

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伯克还认为史学研究应当努力去填补过去的空白,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他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1987年)中开始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研究。80年代末,他更把注意力从意大利和荷兰的民众文化转向法国的高层政治文化研究,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制作路易十四》(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年)。这部著作研究了这位太阳王的各种形象是如何创造、接受和传播的。伯克的目标依然是试图寻找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上层人物与广大公众之间以及原创作中的文化信息与以后的接受者所附加的社会和心理因素。这部著作透露出了一种新的史学思想:他强调他所称的文化“建构”或“创造”。《制作路易十四》体现了这一趋势。他之所以选择“制作”(fabrication)而不是“创造”(invent)一词是为了强调这位国王形象的物质性和集体建构的共同作用。“制作”并不表示路易十四是人造虚构的。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路易十四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在制作他的过程中得到特别因素的影响。“制作”表示一种过程,可以传达出发展、演变的意味。路易十四“形象”的制作者是当时的画家、雕刻家、版画家、裁缝师、假发制造人、舞蹈教师、诗人、典礼仪式主持人和设计者等等。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接受了国王表面形象;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国王的光环基本上不过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用以欺骗人的把戏。他的《蒙田》(Montaigne, 1981年)也属于这类研究,探讨了这位16世纪神学家的形象是如何被人们一再创造和接受的。

集彼得·伯克三十余年来的全部著作,为人们描绘了六七
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文化史,揭示一部“高级”文化和“民
众”文化的创造和被接受的历史,说明了各种社会阶层对待过
去的态度。随着这些著作的问世,伯克成为了世界知名学者,
也使他自已成为一种史学现象,从柏林到布达佩斯,从剑桥到
堪培拉,从巴黎到普林斯顿,从旧金山到圣保罗,从东京到特
拉维夫,人们都在讨论着伯克的发现和著作。《一个宫廷画家
的命运:欧洲人对朗世宁绘画的接受》(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1995 年)描述了这位 18 世纪著名画家心目中的世界,也描述
了他所创造的形象如何被同时代的画家如保·布鲁梅尔、切斯
特费尔德、怀尔德和耶茨所接受的过程,把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
背景下艺术的创作和接受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近些年来他
先后完成的《安特卫普:从比较的角度看的中心城市》
(Antwerp, a Metropoli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3 年)、
《意大利艺术史》(History of Italian Art, 1995 年)、《养家糊口》
(Support for Families, 1996 年)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文艺复兴时
期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当然,从伯克身上我们既看到了突破,也看到了继承。伯
克的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社会
和文化理论的影响。当代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更给
了他直接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斯·格拉克曼、埃尔文·戈夫曼、
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克利福德·格尔兹。伯克的著作中大量引
用了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的观点,其文化的
概念和研究的领域也得以扩大。继他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1985 年)之后出版的《年鉴学派论著中的近

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和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ssays from Annales, 1972 年)、《费弗尔论著中产生的新型史学》(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1973 年)、《法国的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 年》(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1990 年)开始了对西方近代史学,特别是对年鉴学派的系统研究。他对年鉴学派是十分推崇的,却又比年鉴学派更加关注于探讨文化过程的作用,更加关注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作品是如何被后人所接受的。

长期以来,伯克一直在鼓吹一种“新史学”,即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意在使用实例研究去扩大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为史学研究增添社会领域的内容,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带来了创新。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史领域中奋斗,确实更新了“文化史”的概念,把它演变为对民众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研究。所谓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经常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他曾从两个角度讨论了它的概念。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不是凭单个人突发奇想,而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的结果。来自不同的国家的许多历史学家参加进来,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又有意大利人和俄国人,如克利福德·格尔兹、爱德华·汤普森、乔治·杜比、卡洛·金兹伯格、阿龙·古列维奇等。他们的研究主题从古代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初,其共同特征是,他们所研究的内容相对于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全新的,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主题的系统尝试。这些主题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

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和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另一方面，新文化史又是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的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新文化史学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在六七十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马克思式风格和计量史学风格[包括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它们都推崇一种“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而政治和文化则是某种超结构。历史学家对这种研究方式和范围所产生的结果很不满意。使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新文化史学家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总而言之，新文化史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着历史的趋势。因此，新文化史呼唤人性在历史中的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历失去联系的社会史所面临的问题而创造的。尽管这种“文化史”仍处在起步阶段上，却已受到了读者和一部分学者的欢迎。但就正统历史学家而言，伯克所实践的这种历史可能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因此伯克有时也谈及他的“孤立”。所幸的是，伯克可以运用担任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的位置去鼓吹和示范他的“文化史”。应当说，新文化史有今天的地位，与伯克的那种独特方式的研究和努力是不可分开的。

伯克的这些研究工作引导他特别重视史学理论和社会理

论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完成了一批理论性的著作,包括最早的《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 1980 年)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论观念与交流》(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 Essays on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87 年)、《语言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1987 年)、《语言、自我、社会》(Language, Self and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1991 年)、《福柯批判文选》(Critical Essays on Michel Foucault, 1992 年)、《历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992 年)。他在《对话的艺术》(Art of Conversation, 1993 年)和《语言和术语:论语言的社会史》(Languages and Jargons: Contributions to a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1995 年)中着重讨论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问题,重新建立了历史学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联系。伯克还特别关注西方当代史学发展新趋势。他的《历史写作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1991 年)和《多姿多彩的文化史》(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1997 年)同伊格尔斯的著作一样,及时地归纳出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十分独特的。本书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一位权威评论家甚至认为,“伯克的这部著作有助于减轻目前以及 21 世纪困扰着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某些危机”。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一些新近著作如《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和边缘》(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1998 年)、《淹没的梦想》(The Drowning Dream, 1998 年)、《新大陆的乌鸫》(New World Blackbirds, 1999 年)以及即将出版的《美洲英雄的形象》(Portrait America Heroes, 2000 年)等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中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文化。他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和边缘》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文艺复兴后的文艺复兴”,把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研究作了地域和方法上的扩大。尽管对于他的研究对象而言,这些都属于“边缘”文化,但他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些地区的文化是整个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阐明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核心”文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十分关注彼得·伯克的历史研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作为一个已经取得很高国际声誉并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成为读者十分熟悉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来说,他过去的著作篇幅都不大,看来以后也不会去写那种大部头的不朽著作。但他一生的学术生涯贯穿着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寻找联系**。如果说聪明才智的本质就是寻找联系和进行比较的话,伯克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总在一些事物之间建立桥梁,在语言、文化、社会、历史阶段、地点以及方法和学科之间寻找联系。根据伯克的透露,他将要完成的著作篇幅也不大,一部是《知识的社会史:从谷登堡到狄德罗》(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预计 2000 年年底出版,另一部是《传媒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Media),将于 2001 年出版。他把这类著作称作“知识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或“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

edge)。他说,这种历史著作试图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它“基本上是但又并不完全是一个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试图探讨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组织,哪些人在哪些地方以及用什么方式接受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又如何被人们使用等等。他说在动手正式写作这些著作之前还需要先组织一系列的讲座和讲习班。当然,像他过去的著作一样,这些研究不是纯计量性质的。看来,当世界正在跨入一场“知识革命”的时候,伯克作出这样的计划,去探讨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知识的产生及其性质和用途,决不是偶然的。

杨 豫

2000年8月12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我在苏塞克斯大学开始我的学术生涯时,我自愿担任了“社会结构及社会变革”这门课的教学,因为我认为在写社会史之前最好先了解什么是“社会”,而在教学中学习是最好的途径。由于讲授这门课的缘故,所以后来汤姆·波托摩尔(Tom Bottomore)邀请我写《社会学与历史学》一书。这本书在 1980 年由 Allen and Unwin 出版社出版,我在书中试图向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介绍在对方学科中可以找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十多年后的今天,Polity 出版社又给了我重订、增扩乃至重写此书的机会。

第二版(即本书)换了一个书名,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书中的内容。初版前言说明了在本书中社会人类学“扮演着比其书名所反映的更重要的角色”,并对政治学、经济学作了一些讨论。然而,到 90 年代来讨论社会理论,恐怕顺理成章地应该涵盖更多的东西,例如传播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法学、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以及宗教研究等等学科和分支学科。同时,一些交叉学科研究,如批判理论、文化理论、女权理论以及纯哲学(不妨定义为理论之理论),也不能不考虑在内。

如此来展拓视野,遇到的难点之多,涉及的范围之大,非

一人之力所能驾驭。尽管我在过去 30 年中在社会理论方面涉猎甚广,并在历史著作的写作中不断思忖社会理论的可能用途,但我本人的史学研究显然是有限的,我一直在从事欧洲 16、17 世纪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对其他地区、其他时代和其他学科至多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如此一来,我便有意选取一些通过研究和教学而熟悉的、具体的例子——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会显得畸轻畸重。

至于说到如何看待这些领域正在取得的进展,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个人的立足点。我这本书所用的观察方法是已故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所称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不是对历史作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在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关联。

这里还有一个语言学问题。既然讨论的范围已经扩大,那么用什么术语来替换“社会学”一词呢?显然,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来表述,是太累赘了。如果像过去所习惯的那样,那么对任何一个不相信研究社会的学者会采纳自然科学模式(即使真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模式)的人而言,它仍是别扭的。“历史学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书名,却易激起人们对一本更富哲理性的书的期待,而这却不是本书所能满足的。

最终我选定“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应理解为包含“文化理论”)这个术语。正像读者稍后将发现的那样,这一选择并非暗示历史学家们在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中只可能对一般性的理论(general theories)感兴趣。相反,这些学科所使用的某些概念、模式和方法在对过去进行研究时也有助益,同时对当代社会所做的个案研究也提示了与早先世纪进行对比和比